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心得

壹、前言

「以古為鏡可知興替」，這是歷代歷朝及至今日眾所皆知的道理。然如何以歷史為借鏡呢？勢必要分析各個歷史事件所產生影響與優劣。而此優劣得失之評斷又豈是談何容易！唯有如本書作者錢穆教授以畢生心力鑽研中國歷代歷史方才能以客觀嚴謹的方向對中國歷代歷史作評斷。

本書主要探討漢、唐、宋、明、清五代的政治制度，內含政府職權分配、考試和選舉、賦稅制度，及國防與兵役制度。上述這些主題看似艱澀的，但作者以較為口語化的方式作有條理的解析，讓人對這些主題更加了解，並讓我對過去在歷史課本上讀過的種種事件及制度等有全新的體悟，以下分述之。

貳、專書概述

一、所有制度的產生皆有其由來

錢穆提醒我們，若憑自身所處時代背景來判斷當時的制度是武斷的，所有的制度產生都有其由來，甚至可能是當時最好的辦法。以中國皇位世襲制而言，其必不被崇尚自由民主的現代社會所接受的，然對古代中國而言此似乎是一種不得已的辦法。可能會有人質問為何古

希臘雅典城邦政治可以做到民主選舉，然古代中國卻無法？若細思當時兩個地方社會及環境條件的差異，則答案則呼之欲出。中國人口數量之多，遠超過雅典城邦千倍，在古代資訊傳遞等不發達的社會下如何能由市民選舉產生一國領袖呢？

儘管皇位世襲，但自漢代起政府內沒有第二個職位、第二個家庭，可以照樣承襲，讓中國各地各階層人才得以入仕途，此亦是在當時背景下所能有的最佳方式。

二、 制度優劣與否與時代背景相關

過去在歷史課本讀到魏晉南北朝用人標準的「九品中正制」時，深覺如此仰賴個人主觀評斷標準的方式，如何能公正客觀？且必定會有賄賂舞弊之惡行。然此種想法即為不了解當時時代背景下的武斷評價。書中敘述「東漢末年，天下大亂，中央地方失卻聯繫，一切制度全歸紊亂，朝人用人無標準，尤其武人濫用人員不依制度。曹操的官員陳群始創設九品中正制，取代過去漫無標準各自援用私人的狀況，一時制度建立，吏治澄清。」

然為何「九品中正制」後來卻被人所詬病？仔細理解這個制度產生的緣由是因東漢末年天下大亂，中央地方失聯所得的一時救弊措施，因此當天下局勢轉變後，仍採此制不加更新，則問題自然多。如同錢

穆所述：「因病服藥，病癒不宜再服。否則藥以治病，亦以起病。」

三、 制度無法全盤效仿

漢代在對農民田租方面，已做到輕徭薄賦，但未能平均地權。因此王莽新政時仿造春秋前的井田制，把一切田畝盡歸國有，並重新分配，禁止買賣，但卻引發大變亂。因其忽略井田制實行的前提是人口數量不能太多，否則耕地無法養活人丁。且無其他配套措施，嚴重所害既得利益者，必然反之亂之。

現今有些學者欲效仿他國政策或制度，然一個制度的成功與當時的社會風氣及相關人事制度的配合有關，貿然引入模仿，極易產生禍端。

四、 無制度的治理將極易有大起大落的風險

大家都知道漢光武帝劉秀是一代明君，讓社會從動盪中恢復，史稱「光武中興」。但卻沒立下得以傳世的良好制度，導致政治社會好壞，完全依照皇帝自身的良窳。使皇帝好，事情就好，皇帝差，事情就差。而政治上並不曾有管束皇帝的制度，這是東漢及將來中國政治歷史上一個大問題。因此建立良好制度才是傳世之根本。制度是治理之地基。

五、 壞制度如同壞地基

若說制度是治理之地基，則壞制度即為壞地基。地基若不穩固，則未來勢必易歪斜，如同明代皇帝。明代有許多特立獨行的皇帝，有二十幾年沒上國朝的明神宗、忱於木工的明熹宗、荒淫無度的明武宗等。明代為何有如此高比例長時間不上朝的皇帝呢？是遺傳嗎？是帝王教育失敗嗎？或許吧，但若追根究柢，此與明太祖廢宰相有關。廢宰相而由皇帝獨攬政事，若皇帝自身雄才大略、英明神武，自然可有一番大作為，但此種皇帝歷代各朝至多兩三位，其餘的多數皇帝其精力及智力較一般，若有宰相等輔政及決策者，其承受的壓力才能減輕，決策才能更精準。而明代廢宰相的作為，使許多皇帝無法總攬如此龐大的政務，因而逃避上朝，而後皇帝和內閣中的連繫，就讓太監居中傳話，長久下來太監反而掌握政府一切最高且最後的決定權，朝野必亂。

六、 出於善意的制度不一定是好制度

明清時代的八股文，被人詬病是項愚民政策。其實八股文這樣的考試內容是出於追求一種公正客觀的標準。其立意良好，希望在眾多應考者當中，以具體可行的標準來拔擢人才，然而卻導致人才為此而

消磨。

反思我們現行的考試是否亦是如此呢？以選擇題等固定式標準答案來作為選才標準，是否真能選出真人才呢？是否讓教育內容僵化，並限制思考與創意的培養呢？然若以申論題作為試題，難免被質疑是否公正客觀？我想這對所有人而言皆是兩難局面。對我而言，我認為過於兩極的制度，皆有所偏頗，應盡可能採中庸之道，並逐步微調比重與評判標準。

七、好的制度亦須經營才能長久

唐代的田賦制度稱為「租庸調制」。「租」是配給給人民耕種的田地，年老仍繳還政府，是一種均田制度，租額僅為四十稅一。「庸」乃人民對國家的義務勞役，每人每年服役二十天。「調」為各地人民將土產上貢。這樣的田賦制度的核心要點在於讓人民皆有田地，且稅制較漢代定額更輕，而且租庸調項目分明，有田始有租，有身始有庸，有家始有調，對百姓而言，租庸調制是相當良好的制度。然此制度要能推行成功，關鍵要點在於要能整頓好全國的人口冊。然而在過去資訊不便利的情況下，要維持戶口調查的準確性需要龐大人力和精神力來維持。故唐代中葉後，租庸調制即崩潰，這是一種人是的鬆懈。因此好的制度是一個好的根基，但仍須透過不懈的經營，方能達到長治

久安之功效。

八、 是制度還是法術?僅憑法術無法長久

制度多出於公，法術多出於私。錢穆認為清代的所有制度皆根據明代，並在明代的制度裡再加上他們許多維護滿人「部族政權」的私心。如清代考試制度，在徵才的缺額中分滿漢之別，且滿人名額遠高於漢人，此即為部族政權的私心，讓原意為開放政權、拔擢真才的考試制度變成讀書人羈縻籠牢之術，僅開放一小角落的政權給漢族讀書人，只作為一種妥協條件。

因此儘管清朝皇帝整體平均素質較歷代素質佳，少昏庸放蕩無羈者，然在凡事過度偏重滿人輕漢人，滿人利益大於全國利益的情況下，加速清朝政權的衰敗，民變四起。因此乾隆之後的清代就算未遇到西方洋人入侵，清朝政權仍無法長久。

九、 誤判制度將無法根本解決問題

清代末年有兩大改革派別，一派以孫中山為首者主張革命，一派以康有為為首者主張變法。康有為認為英國、日本等國家皆有皇帝，所以不一定要廢皇帝，只要推行憲法，讓滿洲人作皇帝也可。但康有為失敗了，因為他誤判局勢。清代的皇帝不是一人專制政權，不是光

緒一人同意變法就可成。清代政治是滿族政權的政治，當光緒仍無法跳出滿洲人這一圈子下，是無法改革制度。若要打破滿族這樣的部落政治，則必得革命。

十、過度避免重蹈覆轍的預防性政策將產生其他後患

五代十國時，軍隊專橫，故趙匡胤黃袍加身當上皇帝後，以「強幹弱枝」、「重文輕武」的方式扭轉晚唐五代的逆流。然卻導致宋代的散與弱。以兵制為例，在宋太祖時，因防兵卒驕惰，各邊防守，全須派中央禁軍，但又不讓其久待，造成軍隊總是在路上跑，軍人只感到一番勞動，雖未年年打仗，但經費上等同年年動員、年年打仗。並且又擔心軍人擁兵自重，故把將官和軍隊分開，使兵不習將，將不習兵，使宋朝武力積弱不振。矯往過度的制度必將產生其他後患。因此建立制度審時度勢相當重要，在宋代初期，因武人專橫風氣仍盛，以較極端的方式或許是恰當的，如同亂勢必用重典，然當風氣已過，則應採中庸之道，方無後患。

參、心得感想

由上述可知，制度影響一國發展之廣之深。無制度，國無法立；壞制度，國無法安。就算是好制度，但過了一段時日後，時過境遷下，

亦可能會變成壞制度。且好制度亦須經營，否則無法長久。這些觀念對於分析事理上是相當重要的，亦才能不易囿於成見。

以教育制度的改革為例，有許多人疑惑為什麼教育制度要一直改，認為以前聯考時代最公平。或許聯考制度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可能是較佳的制度，讓各個階層的民眾得以藉由努力鑽研教科書來獲取較佳的社會地位，改善貧困。但現今整個大環境變動之大，無任何時代可比擬，制度既然與人事相合，人事不斷變動下，制度勢必須改變。但如同錢穆所說：「每項制度之變，也該有可變的限度，所貴的是要在變動中尋找他不變的本源。」制度要調整改變前須審慎分析「可變」與「不變」之處。如同教育改革中，不變之處可能是達到階級流動、適才適所、強化教學品質等，這是從過去聯考制度到現今中不應且不該改變之處。然如何達到此目的，此即為「可變」之處。但制度要達初心，其他制度的配合，不懈的經營皆是不可或缺的一塊。我們在評斷制度成敗與否，上述的環節亦為重點，若誤判將無法根本解決問題。

除治國外，公司企業、各類職場、學校，甚至在班級經營上亦須重視制度。制度如同框架，在歪斜不穩的框架下，遑論有良好的前景。適時檢視及分析場域內是否有制度，制度是否合宜，此制度是否是出於某人或某團體之私心，才能有良好的發展根本。像在學校場域中，

有些教師能力佳，在教學及班級經營等皆表現良好。然有些教師則未能有良好表現。而學生與家長只能期待他們能有好運氣遇到好老師。雖然這看似教師自身的問題，然是否亦代表我們無相對應能支持輔導教師成長的合宜制度與機制呢？書中所述東漢及明代因國無合宜的制度，因此皇帝好，則事情好，皇帝壞，則事情壞，將國家的興衰全操之於一人手中，此種極具冒險的方式非治國之道。教學場域亦是如此，每位學生在成長學習的關鍵點上所仰賴的教師素質優劣若也須憑運氣，則教育如何能成功？我們無法期待所有人皆有良好的能力，但我們或許能有一良好的制度來避免此種狀況產生。

總而言之，制度是由人產生的，而人亦在制度下生活發展，制度與人習習相關。上位者須不斷檢視制度是否合宜，並以謹慎的態度經營好的制度，勿敷衍塞責，方能達到功效；而民眾亦須以較客觀的態度針砭時事，切勿武斷，畢竟制度良窳之評斷並非易事，須考量許多主客觀等的局勢變化，如同錢穆在本書最後一段所述：「當前英國哲人羅素所言：『講哲學，至少有一個功用：即在減輕人一點武斷。』我想講歷史，更可叫人不武斷。」唯有以此態度，才能真正以古鑑今。